长征中的女红军们

“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个“难”字，道出了长征的艰难险阻。长征路上，红军女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用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生命极限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革命巾帼英雄的代表。

长征中的女红军们。

三千多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数以千计的女红军不畏艰险参加了长征。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总数为32名，包括干部30名、战士2名，其中27名干部与2名战士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女革命家如蔡畅、康克清、邓颖超、刘英、贺子珍等都在此行列中。她们当时都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1934年，蔡畅和康克清分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邓颖超和刘英则在长征中担任过中央局秘书长，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红二方面军中女红军为20多名。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长征。其中，红六军团有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军。在这支部队中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她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部队。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总数约达3000人，拥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独立团作战部队，先后有2个团参与长征。

红25军中的女红军仅有7名。1934年11月，红25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包括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等7人作为随军护士得到批准跟随红军转移，被称之为“七仙女”。到达陕北时5人幸存。

写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女红军跟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同时她们克服了重重磨难，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写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1933年4月与川军的对战中一战成名。当时，军阀刘汉雄率领的川军一个独立师，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500名奉命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的女红军遭遇。时任团长张琴秋深知敌强我弱，不可暴露火力，决定智取敌人。她指挥官兵们迅速占领制高点，一枪不发，静等敌人靠近，进入最佳射程时一声令下，女战士们火力全开，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以为遇上红军主力，顿时乱了阵脚。张琴秋趁机率团冲进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一个团的枪支弹药。这场战斗让全川为之大震。女战士们还参与了攻克剑门关的城关，为后续部队开凿爬雪山的“天梯”以及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等战斗。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量最多，但因战斗任务牺牲很大。原本约3000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百人。

中央红军的女红军相对较少，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出发不久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妇女队，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转战环境中，组织上没有给予她们太多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基本一致。康克清曾亲自指挥红军作战，歼灭敌军20余名。在行军中，她经常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贺子珍曾冒着敌机轰炸救护伤员，导致全身中弹17处。

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女红军筹集物资、保障后勤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在中央红军初次经过马尔康地区时，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就肩负起筹粮工作。为了能让部队吃得上饭，她们坚决执行命令，努力筹粮。但国民党在当地进行反共宣传，对土司们威逼利诱，向群众鼓吹红军非常“危险”，称若有红军到来，任何人不得提供帮助，如若违反，军法重处。当地老百姓也不会讲汉语，交流中面临语言障碍。为此，筹粮团只能找懂汉语的生意人当翻译。这时女红军的性别优势起到了作用，当地百姓看到跟随翻译过来的是柔弱的女性，便不那么惧怕了。最终，女红军们不仅宣传了红军的政策，还筹到了不少粮食。

红二方面军的20多名女红军被编入各个部门。其中有的被安排负责筹粮做饭当炊事员，也有从事军需被服工作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第二团的主要任务是后勤保障，保卫后方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运伤员、筹粮运粮等。红25军的7名女护士主要负责照顾伤病员，也负责他们的伙食，她们把饭让给伤病员吃，缺少粮食，就到山上寻找野果、树皮，掺上米糠，给战士们充饥。

医疗救护、照顾伤员。长征途中，女红军往往还担负着在战斗中冒着炮火到一线抢救伤员、将受伤的战士转移到安全地点的任务。红25军的“七仙女”医护小组拥有相对专业的医护知识，对伤员进行医疗救治、包扎治疗等工作，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溶液给伤员消毒，行军途中药品紧缺，一到驻点就想尽办法四处搜集、购买。药品缺乏时就在行军路上采集有药用价值的中草药熬成汤，给伤员清洗伤口、治病。她们日夜轮流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顾，帮助伤员解除伤痛，对吞咽困难的重伤员，就一口一口喂药喂食，挽救了不少红军的生命。其他部队的女红军也负责照顾伤员工作，中央红军的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文艺创作，鼓舞士气。文艺工作是女红军们的长项。长征中涌现出一批有文艺才华的“战地百灵”。李伯钊是红军中的艺术家，长征之初她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按照时间先后随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三过草地，一路行军一路演出，率领红星剧社在战斗间隙给红军战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创作了话剧《干人当红军》，歌曲《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编演了舞蹈《红军舞》等。红军战士们在行军的夜晚宿营时唱起《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我们打垮它！”这些优秀作品鼓舞了士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中央红军的蔡畅，也是长征中的文艺骨干，她常常给战士们讲她在国外留学的经历，甚至还会高唱《马赛曲》。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红色娘子军》主题歌，正是参加长征女红军的生动写照。在这个本来只应属于男性的漫长征途中，女红军们克服生理上、环境上的困难，在斗争中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从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搞特殊，更不以职位高低谋特殊，始终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自警自律；常常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舍身救护战友。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先驱和榜样。 （据《学习时报》）

读史忆人 典故

新中国有办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1948年8月，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周恩来亲自指挥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与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安排大量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虽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部分北上民主人士在一些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与我们党仍有分歧，比如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比如新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还是旧民主主义道路？等等。为使他们尽早“拨开云雾见青天”，党中央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引导。

一方面，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待民主人士要坦诚相待，耐心向其解释党的政策，积极地教育和争取他们，欢迎民主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做民主人士的思想工作，为其做时政报告，向其展示一个全面、真实和客观的解放区政权形象。

该时期美国扶蒋反共和扶助日本侵略势力从反面教育了中国的民主人士。战后美国源源不断地向蒋介石政权提供物质援助，与其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还帮助日本修建军事设施和训练军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情感。1948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民盟等8个民主党派联名发表了《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历数美国侵华罪行。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系列文章，并于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了中国的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的“和平”阴谋，逐渐使得民主人士统一了思想和认识。

另一方面，党中央还积极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观学习，鼓励他们深入工农群众。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就曾在东北局的组织下，参观了沈阳机车车辆厂、沈阳市郊农村、抚顺露天矿及鞍钢等地，亲眼见到了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生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旧中国常见的吸毒赌博等社会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章乃器深有感慨地说：“解放区人民的伟大力量是我过去意想不到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找不到解放区这样光明的时代。”他因此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不但善于破坏旧中国，也善于建设新中国。”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9年4月以民族工商业家吴羹梅为代表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该团参观后表示，东北工业的恢复速度“超过预料”，“人民力量伟大，新中国有办法”。解放区实施的各种改革，有效地发挥了民主集中制，中央政策能够下达于基层，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并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来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形成了钢铁一样的集体，“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

（据统战新语）

拾遗

梁实秋与厚德福的渊源

梁实秋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北平一家名叫“厚德福”的河南馆子，对那里的饭菜赞不绝口。厚德福门脸古老简陋，很不起眼，尽管门里灯火通明，香味扑鼻，但门口却只有一灯摇曳，怎么看也不像个饭馆。

厚德福老板陈莲堂是河南杞县人，家境贫寒，小时曾经讨过饭，后来到京城闯荡，当过同仁堂药店的厨师。陈掌柜手艺很好，能做地道的河南菜。厚德福与梁家结缘，始于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梁咸熙是位美食家，据他的孙女梁文茜回忆：“那时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祖父梁咸熙是个很讲究吃的人。当时家里虽然有高厨掌灶，但他依然经常到外面的饭庄或小馆去寻喜欢吃的东西。在他的影响下，小时候我常随祖父坐着洋车去品尝京城各家的美味。”在品尝京城美味的过程中梁咸熙与陈莲堂相识，于是便向这家豫菜馆投资，成了厚德福的股东。

多年后，梁实秋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在他建议下，厚德福到青岛设了分号。梁在《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中回忆说：“厚德福是新开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饭庄老掌柜陈莲堂先生听我说起青岛市面不错，才派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岛来开分号。我记得我们出去勘察市面，顺便在顺兴楼午餐，伙计看到我引来两位生客，一身油泥，面带浓厚的生意人的气息，心里就已起疑。梁西臣点菜，不假思索一口气点了四菜一汤，炒辣子鸡（去骨）、炸肫（去里儿）……伙计登时感到来了行家，恭恭敬敬地问：‘请问二位宝号是在哪里？’我们乃以实告。此后这两家饭馆被公认为是当地巨擘，不分瑜亮。”

厚德福颇有几样拿手菜，比如核桃腰、铁锅蛋、瓦块鱼等都是独门手艺，别有风味。许多年后，梁实秋对此依然念念不忘，都将它们记在文章里。

厚德福是幸运的，因为梁实秋的文字，后人记住了这家河南馆子。

（据《海南日报》）

潘光旦：利用优生学种葫芦

潘光旦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后来又选修了植物学。1934年，35岁的潘光旦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爬，夏天也可以乘凉。

过了两年，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光旦起初担心它们长不好，谁知它们很争气，齐头并进，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像对双胞胎。兴奋之余，他也多了些许关心，最终“瓜熟蒂落”。他觉得这是对他学植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二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后来，潘光旦就把这对并蒂葫芦挂在书房里，当“镇宅之宝”。人们称他的书房为“双葫芦斋”，潘光旦喜形于色地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

（据《天津日报》）

宋朝人喝茶 先将茶叶磨成粉

当时一盏茶里有大讲究 和我们今天的茶文化大不相同

说到中国茶文化，很多人都会想到唐代的陆羽。其实在宋朝，爱画爱茶爱琴爱书法的宋徽宗，也曾以一国之力将茶文化推到了一个高峰。经过千年沉淀，这一切都尘封在了史书中。

宋代的茶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与我们今天饮茶有何不同？

精致风雅夜间不打烊 有的店专供女士喝茶

两宋时期从皇宫到民间，茶都是生活必需品。王安石在《议茶法》中写道：“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东京茶坊的盛景：“朱雀门外除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甚。”夜市的茶坊非常热闹。南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记录了江南的茶坊：“临安，处处各有茶坊。”

北宋时期，夜市繁华，茶楼至夜营业，游客熙熙攘攘，甚至还有专门供女士喝茶的北山子茶坊，里面有仙洞、仙桥，出门游玩的女人们，夜间就去那里喝茶、享乐，风气十分开放。

北宋，商业街的茶坊内不但供应茶果，还挂画、焚香、插时令鲜花，将茶与生活美学完美统一，是会友闲谈，吟诗作赋的清雅之地。

茶坊精致而风雅，价钱也贵。也有底层穷人没钱进入茶馆享受，他们也爱喝茶，于是街上又出现了提壶叫卖热茶的小贩。

审安《茶具图赞》中所附12件茶具图。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宋代制茶器具繁多 “十二先生”各有用处

宋人离不开茶，贵族、文人出行，还有茶童挑担备齐整套点茶工具，茶叶泉水之外，还有如炭炉、汤壶、茶盏……具体到一盏茶的细节，与我们今天泡茶完全不同。

宋代的茶，先要磨成粉，过程十分烦琐。南宋刘松年有一幅画《撵茶图》，画的是文人雅集。画中有一个情景，很好地还原了宋代的磨茶过程。图中左下角的一位男性跨坐在长方形的小几上，小几前方有一个手推小磨，小磨中是炙干的茶叶，男子左右摇动小磨把手将茶叶磨成粉末。他旁边放着茶帚，用来扫茶粉，收入容器。这个将茶磨粉的过程，是宋代喝茶的准备工作。研磨茶粉现场进行，是为了保护茶叶的鲜香。

宋代制茶器具繁多，先有茶笼，保护远方运来的茶叶不受潮湿；后有茶钤，用来炙茶，文火将茶叶烤干；再用砧椎来碎茶；茶叶碎后，才用到茶碾，就是《撵茶图》中的磨茶工具，将茶叶一点点磨成粉末；接着用茶罗，磨碎的茶末要用细罗再筛一遍，获取更细腻更纯净的茶粉。茶粉完成，准备茶匙（量粉）、建盏（盛茶）、执壶（热水）、茶筅（击拂），才算材料备齐。

南宋审安老人著作《茶具图赞》，用线条勾勒出十二件茶具的模样，还按照宋代的官制对茶具进行“授衔”，称为“十二先生”。十二件茶具分别是：金法曹（茶碾）、漆雕秘阁（茶托）、石转运（茶磨）、汤提点（汤瓶）、竺副帅（茶筅）、陶宝文（茶盏）、罗枢密（茶罗）、木待制（茶臼）、宗从事（茶帚）、韦鸿胪（茶笼）、胡员外（水杓）、司職方（茶巾）。

“水丹青”高手宋徽宗 可在茶汤上“画”星月

宋人爱茶，既有独自小憩，也风行聚会斗茶。比起闹哄哄的酒局，宋代的斗茶风气十分风雅有趣。

宋代斗茶以点茶为主，点茶时，先烫盏，盏热而汤花不容易浮，然后将茶粉置于建盏内，一手执壶注入少量开水，另一只手以茶筅迅速击拂茶汤，将盏内茶末击打如膏状，继续加水，再次击拂，点水七道为最佳。点水时，要有节制，落水点要准，不能破坏茶面。与此同时，还要将另一只手用茶筅旋转打击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也可称为运筅，汤花就是最后的效果。

斗茶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品评参与者的茶叶优劣、水质如何、汤花可白、咬盏是否持久，是从茶叶、用水、技艺、香气等全方位的考验。

点茶最高妙者，不但茶汤咬盏持久，茶水清香幽漫，还能用清水在乳白的茶汤上点画出图案，叫做茶百戏，也叫水丹青。

茶百戏见功力，见审美，能在茶汤上以清水点出各种花鸟鱼虫，山川树木，甚至是整句的诗句。宋徽宗就是水丹青高手，他点汤的时候，可以使茶面上浮出朗月疏星，意境高妙。（据《厦门晚报》）

（资料图片）